



未名·观点丛书



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欧阳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观点丛书

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欧阳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欧阳哲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未名·观点丛书)

ISBN 978-7-301-20276-0

I. ①探… II. ①欧… III. ①胡适(1891~1962)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782号

书 名: 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著作责任者: 欧阳哲生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276-0/B·103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02@sina.com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369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代序 胡适的文化世界

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代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显赫的地位,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或象征,胡适无疑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

中国人文学术从19世纪后期开始酝酿新的突变,其变化更新主要出自二途:一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寻找新材料,拓展新领域,借用新工具,发展中国人文学术,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此谓推陈出新。一是通过传播外来学术文化(主要是欧美科学文化),扩大国人的视野,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所谓援西入中。两途并非判然有别,而是相互影响。外来学术文化为人们重新认识、整理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遗产提供新的借鉴,本民族习惯的思维模式和兴趣爱好又制约着人们对外来学术文化的选择和理解。它们构成推动中国人文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双重动力。

这一文化转型与几代中国学人的持续努力和辛勤劳作分不开。大致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至1915年,西学传输已初步展开,国学(特别是经学、子学)研究渐露新机,是为新学之草创阶段。这一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孙诒让、夏曾佑、罗振玉、王国维诸人。如论其影响力,当首推梁氏;而以治学之邃密,成就最具创获性,则应认王国维。从1915年至三四十年代,西方各种新的主义、新的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学术界,国学研究层面大为扩展,新的学科体系逐渐建立。中西交融,古今错落。此期大家荟萃,各有专精,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的史学研究,董作宾、李济的考古学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钱玄同、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欧阳渐、吕澂、汤用彤的佛学研究,冯友兰的哲学研究,金岳霖的逻辑学研究……他们学有所

守,相互切磋,建构了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基本框架。平心而论,若论对此一时期学术文化之风气影响最巨者,则无出于胡适之右。

胡适属于通才型的大家。他常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其论学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等领域,在学科分工日趋专业化的现代,如以某一学科的具体成就而言,也许不难找到与胡适匹敌,甚至超越胡适者;但像胡适这样在诸多领域取得一流的成绩,或发生重要影响,确属罕见。

胡适一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1891—1917)、前期(1917—1937)和后期(1937—1962)。

早年是胡适学业的准备阶段。这时期他在家乡经历了九年的传统教育(1895—1903),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国公学等处接受了七年不中不西的新学堂教育(1904—1910),然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0年9月—1917年7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训练。胡适的求学过程可谓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的一个缩影。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学生涯,又为他学业成长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七年,胡适不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而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志业坚实的基础。一部《胡适留学日记》是他这段生活的自供状。只要把胡适的这部日记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学术文化状况作一比较,即不难看出他思想超前的一面。后来亦留美的梁实秋先生曾感慨地说:“我读过他的日记之后,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①可以说,胡适的“暴得大名”自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但与他本人优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的相对超前分不开。

胡适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文化巨人,首先是因他的名字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讲到新文化运动,多年来各派、各党之间曾就

^① 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收入《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1月版,第138页。

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发生过争议和辩驳。然证之于历史事实,以当时的作用和影响而言,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可谓举足轻重。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中国文化的革新运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这一运动拉起民主(人权)、科学的大纛;蔡先生整顿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治校方针为新思潮、新文化护航;胡适在这时期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尝试集》、《胡适文存》等著作,以其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关于这一历史情形,陈独秀晚年曾有明白的交代:“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

胡适自谦“但开风气不为师”,其实新文化运动作为克服民族文化危机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职责即是创造新的文化范式(Pattern)。这种新的范式具体体现于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建构新的学科框架;一方面又通过新的成果、新的人格精神,提供工作典范和道德模范。但既然是雏形,就相对粗糙,需要精雕细琢;既然是框架,就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在文学和道德两个领域取得突破。所谓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胡适的先导作用亦是表现在此。在文学领域,他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继后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论短篇小说》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铺垫理论基础。他身体力行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尝试,写下了新诗的第一部拓荒之作——《尝试集》。他最早推出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第一集,这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一般论者认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成绩以短篇小说和新诗两种体裁为最大,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谈新诗》在指导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是短篇小说和新诗的金科玉律。他创作的《尝试集》和翻译的《短篇小说》一集在

^①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原载《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642页。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中也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胡适主张建设新道德。他宣传易卜生主义,极力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主张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权,主张妇女解放,主张对旧的家庭制度进行改革,主张对陈旧的陋习进行革新,这些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动力。“五四”时期的一代新青年奉胡适为自己的导师,正是基于此。应当说明的是,胡适是个性解放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的个人私生活又表现得相对严肃,以至成为各方面能够接受和容纳的新派人物。这也反映出胡适本人在新道德建设中较为成熟的一面。

在思想领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实验主义》长文,并借其老师杜威来华讲演的声势,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即“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提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哲学武器,这也是现代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表现与他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所创造的实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为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范式,现代学者公认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成立的标志。此书的优长诚如蔡元培先生序中所言:“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作者时代、辨别著作真伪和揭示各家方法论;“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各家的长短“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四是系统的研究”,显示各家“递次演进的脉络”。^①《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这些特点恰好反映了胡适治学的两面,即继承清代汉学考证方法的一面,现代学术理念的自由意识、历史意识的一面。

胡适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先生与胡适关系密切,胡适督促其整理、出版新的中国古典小说本子,其内容包括:一是给原文加上标点符号,二是给原文分节分段,三是在正文前写作一篇介绍该书历史的导言。^②这项工作胡适亲自动手,从《儒林

^①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② 《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收入《胡适文集》第1册,第397页。

外史》开始,然后是《水浒传》,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胡适为该书所作的前言——《〈红楼梦〉考证》,以大量的新材料周密论证了“《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中做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①首次提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体小说,一时激起巨响,此文的刊发标志着新红学的崛起。胡适的古典小说考证这一工作的意义“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为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②。将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一顾的古典小说提升到现代学术殿堂来研究,胡适当有开创之功。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强调新文化运动之创新的一面。殊不知这一创新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创获对后来中国文化学术的趋向有影响者,如他拓展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实为将乾嘉汉学的考证方法运用到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他提倡的白话文也不过是长期流行于民间的口头话语;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亦大量采用清代汉学家的考证成果;他倡导的“整理国故”更是与乾嘉汉学——清末国粹派的活动一脉相承。因此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抉择不仅应看到其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亦当重视它与中国人文传统相联系和发展的一面。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四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他本人也是在这四个层面展开自己的活动。

“五四”以后,胡适曾发起并身体力行“整理国故”。关于这场运动,我以为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强调历史科学的实证性;二是拓展历史研究的材料和范围,将历史研究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三是大规模地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清理,对前人所存在的一些误判和疑误重新予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先后撰写并出版了《胡适文存》(二、三集)、《胡适论学近著》(后改为《胡适文存》四集)、《白话

①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文存》卷三。《胡适文集》第2册,第457—458页。

② 《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收入《胡适文集》第1册,第397页。

③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胡适文集》第2册,第551页。

文学史》(上卷)、《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戴东原的哲学》、《章实斋先生年谱》等论学著作。其工作范围大致可归于“整理国故”。从知识增量的角度看,胡适这时期的学术工作进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典小说考证。胡适除先前对《儒林外史》、《水浒传》和《红楼梦》三书考证外,这时期还对《西游记》、《镜花缘》、《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予以考证和评介。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亦有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发现。胡适的考证主要涉及这些作品的作者、版本源流等文本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小说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小说考证颇受行家重视。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逝世,中央研究院院长出缺,陈寅恪极力推荐胡适,他认为胡氏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研究,在国外的学术界很有影响。^①

二是文学史研究。胡适先是利用在国语讲习所讲课的机会,写作了一部《国语文学史》书稿,后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修改、扩充,写作了一部《白话文学史》(上卷),其中提出了双线文学的观念,即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由御用文人写作的僵化的死文学。这成为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中心观念,亦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革命性理论。

三是禅宗史研究。1924年,胡适动手写《中国禅学史》稿,写到慧能、神会时有所怀疑,便决心搜求史料。1926年在巴黎、伦敦他发现了神会的三种语录和《显宗记》,其后他层层挖掘、步步深入,发表一系列研究禅宗史的文章,如《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论〈牟子理惑论〉》、《陶弘景的〈真诰〉考》、《〈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神会和尚遗集》等,胡适可以说是利用敦煌史料研究禅宗史的第一人,他的有些论断,如南宗“实自菏泽始盛”,充分肯定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亦为同行们所公认。他提出的一些看法虽引起争议,并曾在禅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这一情形本身亦是对禅宗史研究的巨大推进。^②

①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的发言》,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14页。

② 参见高振农:《胡适及其中国禅宗史研究》,收入氏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19页。

四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二三十年代以后,胡适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逐渐推向中古和近世。这方面他的著述主要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和有关宋代思想家李觏、清代思想家戴震、费氏父子等。其中他所写的《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章)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最能反映他本人的思想性格。胡适中年以后有意想重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以代替他原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打算,故特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以便让其单独流行,^①然因种种原因他的《中国思想史》直到晚年也未能如愿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此事常遭人讥议,梁漱溟先生甚至说:“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②梁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胡适写中国哲学史的困难实为其学风所限。胡氏重视史事辨析,他与汤用彤等北大系的哲学研究者以为中国的哲学研究当从弄清哲学史入手,不可贸然建立哲学体系,他们与清华大学的冯友兰、金岳霖这一派人不同,其哲学研究均以哲学史见长。研究哲学史又强调哲学史料之辨析,故其所作哲学史往往又只能是断代的,或个案的。以这种做法写通论性的中国哲学史,自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五是关于先秦诸子的历史考证。胡适自1917年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向汉学界的最高权威章太炎提出挑战,^③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其后写作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主要是对先秦诸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研究,其中一些看法(如关于老子的年代)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二三十年代他继续花大力气研究先秦诸子,曾就《墨经》问题与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讨论,就老子年代问题与梁启超、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人展开辩论,就儒的起源对章太炎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是子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他的一些观点,如老子先于孔子,已被现今的考古新发现所验证。

① 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收入《胡适文集》第6册,第158页。

② 参见梁漱溟:《略谈胡适之》,收入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3—4页。

③ 参见《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胡适文集》第2册,第180—186页。

胡适的学术研究至30年代中期,可谓步入了高峰。遗憾的是,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的工作发生了异动,其学术发展势头也随之受到了抑制。

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胡适受命赴欧美做外交工作,开始了其人生的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胡适担负了一些重要公职,如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8—1942)、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8月—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1962年2月)等职。其中担任驻美大使这一职务,明显地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以至他积劳成疾。即使在他赋闲的两段时期(1942—1946年7月、1949年4月—1957年),胡适也是闲居在美,与国内的知识界关系不大,这亦使他失去了与国内学术界对话和相互切磋的语境。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学术经过多年的积累,由“五四”时期的初创向更为细密、更具独创意义和更具民族特色的高一阶段攀升,产生了一批经典意义的新成果。如冯友兰之“贞元六书”,金岳霖之《知识论》,陈寅恪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胡适工作异动的另一影响是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应有的重心。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蔡元培先生的逝世,蔡先生的去世使中研院院长一职空缺,这本是胡适回国的好时机,国内的许多人亦抱持这一希望。然蒋介石却以朱家骅补缺,这一任命不啻使国内知识分子失去一重心。朱氏与负责西南联大校务的蒋梦麟虽具行政才干,但因其与国民党关系过密,很难起到聚合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北大与中研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又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当局对其刮目相待。蔡先生去世后,以资望和学术地位衡量,胡适当是合适的替补人选,蒋氏无意安排胡适,意在将北大和中研院纳入“囊中”。^①故抗战八年胡适旅居美国,于其个人学术研究是一大损失,于中国知识界亦未尝不是一难以弥补的缺憾。

胡适卸任后旅居美国时的学术工作主要是从事历史考证,其中最为人乐道者是他的《水经注》考证,胡适研究《水经注》,其意是为其乡贤戴震翻案,即推翻近二百年来许多权威学者所认定的戴震抄袭赵一清、全祖望的校

^① 参见耿云志:《胡适与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风波》,收入《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30—232页。

书疑案,这是一项几无思想活力的研究工作。故其无论是成是败,都不具学术前沿的性质。^①四五十年代,胡适倾其心力从事《水经注》研究,在大量的演讲中以宣传自己的《水经注》考证为主题,然这一研究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相比,影响力却极为有限。此外,这一时期胡适在汉魏史事的历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治学方法等方面,也留下了不少文字。50年代后期,胡适曾有意完成自己所未竟的“两三部大书”,^②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以今日眼光平心论胡适之学,其学问范围实为两目:一是考证本国历史史事,其小说考证、诸子考证、禅宗史研究等历史考证,均属此类。本来考证乃清代汉学家法,胡适吸取戴东原、章实斋、崔述诸人之史学思想精髓,傍依西方校勘学之法门,将实证与解释融为一体,将史事考证科学化,其成果真正称得上邃密。其能与章太炎、王国维等人比肩亦本于此。中国的历史材料丰富,作为历史研究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即是对历史材料的辨认、考证和梳理。这一工作在传统学术范围内实已展开,然将这一工作注入现代科学的理念,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却是胡适之功。他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校勘学方法论》、《考据学的方法与责任》、《治学方法》诸篇可谓论述考证方法的经典之作。胡适历史考证的另一特色是其颇具人文色彩的叙述方式,胡适因受中国古典小说熏陶,采用说书的方法来写作历史考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故其考证文章读来也使人感到兴趣盎然,绝没有传统汉学的枯燥,这是同行学者颇不易做到的一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当在历史史事考证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方面均获重大进展,前者因获得传统的底蕴在今日仍为人们不敢低估;后者因取自外域,尚属初创和尝试,难免不当。胡适成于考证,亦限于考证。

二是取外来观念与本国固有之传统相互映照,其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属于此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强调史料辨析,不具道统观念(把孔儒

^① 有关胡适《水经注》研究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参见吴天任编:《水经注研究史料续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② 参见1956年11月18日胡适致赵元任信,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91页。

与诸子平等看待),重视开拓传统视野中被忽略的一些有思想个性的哲学学派或哲学家,这是其哲学史研究的特点。他治哲学史(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鲜明的现代意识。早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胡适就提出:

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①

他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即是贯穿了这一宗旨,其晚年所作的《中国传统与将来》、《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讲演,更是将这一取向表露无遗。

凭借自己多方面的成就和巨大的社会影响,胡适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界逐渐取得“霸权”地位。但仅仅只有文化成就为依托,显然还不足以衬托一个知识领袖的地位,胡适对知识界的影响是通过多种渠道辐射而成。他在北京大学工作长达18年之久,担任过文学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中国教育文化乃至社会政治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胡适对校内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享有极大的发言权和特殊的影响力,许多教授都经他推介进入北大。他参与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转移一时之风气的重要报刊的创办、编辑,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国学季刊》、《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评论》、《大公报·文史》等,是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发言人。他实际影响了一些重要出版机构的运作,推动了一批重要出版物的问世。如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胡适与之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并影响其出版意向;亚东图书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成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是与印发《新青年》、《新潮》、《胡适文存》和一批由胡适重新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他与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的关系极为密切。从1928年最初被聘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到1935年担任第一届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 逻辑与哲学”,收入《胡适文集》第5册,第11页。

评议会成员,到1948年被选为第一届院士,再到1958年出任院长,胡适为这一学术机构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中研院”的第一大所——史语所,几被外人视为胡适派的阵地。^①他自1927年起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驻美特设委员会主席、干事长等职,中基会在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参与了该会大部分年会、常会和工作会议,对其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②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文教界的突出地位,反映出他对现代文化传播媒体的成功利用。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影响、领导了中国教育、科学。

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灵魂。他在这一思想流派中被奉为宗师式的人物,有着好几代追随者和敬仰者。胡适一生虽未参加任何党派,对政治亦不过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却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早在“五四”时期,他即极力宣传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使新文化运动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创办或编辑《努力》、《新月》、《独立评论》等刊,从主张“好政府主义”,到发起人权运动,到关于民主与独裁关系的讨论,他恪守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中国的现实政治,希望通过日积月累的进步,使现代性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形成了民主与极权的两极对立,胡适开始转向对德、意、俄的极权政治的批判,为民主政治辩护,表达了一种与时代潮流不同的强音。他提出自由主义所应包含的四重含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对党,四是和平渐进的改革。晚年他又特别强调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可以说,胡适一生笃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不渝地坚持维护人权、自由、民主,是现代中国最具诠释力的自由主义发言人。他对中国与世界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类前途的深刻认识,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表现

① 有关胡适与中研院的关系,参见王志维:《胡适先生与中央研究院》,收入197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欧阳哲生:《胡适先生与中研院史语所》,收入《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10月版,第217—232页。

② 有关胡适与中基会的关系,参见季维龙:《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收入《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86—209页。

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良知。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过去人们论及胡、蒋之间的关系,一般习惯于从胡适这一方面来看待双方的交往。的确,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胡适表现了一种学者式的谨慎和温和,这种态度使其与当局存在一种既抗争又合作、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但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处于支配的地位,他上台后面临两大敌人:一是武的,如割据一方的军阀和共产党红色政权;一是文的,即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文化上的敌人,蒋介石也施展了传统政治术中硬软兼施的两手。杀害史量才、杨杏佛即是表现其冷酷、残忍的一面,对于胡适,蒋介石从人权论战时查封《新月》,组织党部对胡适围剿,逼迫胡适离开上海;到30年代中期,利用民族矛盾,整合各种异己势力,蒋氏对胡适本人的处理显然达到了目的,其征调胡适做外交工作,似乎是不可抗拒的理由,表面上看去是重视胡适,实则调虎离山。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联系实际上掌握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龄)手中,胡适实为蒋利用的一个花瓶而已。蔡元培先生去世,国内知识界属意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将胡适调回国内,本是顺理成章的一着,然蒋无意作此安排,闲置胡适,这不能不说是其控制知识界,隐含深意的一步棋。抗战胜利,北大复员,蒋又有意让傅斯年掌北大,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对胡适的防范之深,只是在傅斯年的一再推辞和推荐下,才出现了胡适出掌北大的一幕。^①50年代胡适流寓美国纽约八年,由于大陆轰轰烈烈的“胡适大批判”运动“帮忙”,才使寂寞一时的胡适重新引起外界的注意,台湾学术界呼唤胡适出山,胡适晚年得以回到台北南港任“中研院”院长,此时的胡适,照他自己的话说已到了退休的年龄(67岁)。在台四年,胡适与蒋的关系极不愉快,在处理“雷震案”中达到了极点。胡适在中西文化论争中所遭到的围剿,表面上看去是与新儒家的冲突,实则是与倾向保守的台岛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其中幕后真正的影子人物自然是蒋介石。^②

通览胡适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无论论学议政,贯穿他一生的职

① 傅斯年:《致蒋介石》1945年8月7日,《傅斯年全集》第7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85—286页。

② 有关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参见刘绍唐:《胡适与蒋介石》,牛大勇:《不打不成交》,两文收入李又宁主编:《胡适与国民党》,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0页。

志和精神主要为二：一是学术独立。一是追求民主。如把五四精神概括为民主和科学的话，胡适一生的工作真正是围绕这两大主题而展开。

所谓学术独立，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个人的学术独立，即个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不将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1944年沈从文致信胡适说：“二十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①沈从文所言“本来立场”即是学术独立。在近代社会激烈动荡，学术与政治难以分割的状态下，学者能否坚持学术独立，不仅是对其个人品质（人格）的考验，且是影响其学术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即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质量不仅受制于专业素质，而且与他对社会政治环境的观察、把握密切相关。二是国家的学术独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解体，中国人不仅面临着一个文化整合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重建国家独立的现代学术体系的问题。早在留美时期，胡适忧虑于中国留学政策之流弊，国内学术之不振，特作《非留学篇》。提出：“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也。必也一面亟兴国内之高等教育，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一面慎选留学生，痛革其速成浅尝之弊，期于造成高深之学者，致用之人才，与夫传播文明之教师。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吾所谓‘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者是也。”^②1947年9月，他又撰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中国学术独立必须具备的四项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

^① 《沈从文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4—575页。

^② 胡适：《非留学篇》，原载《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1月第三年本。收入《胡适文集》第9册，第684页。

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他深信:“用国家的大力来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一定可以在短期间内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①胡适晚年最后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其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现代科学如何在中国生根的问题。

胡适另一个喜与人道及的话题是民主,他对民主的思想包含着建设一种“无限制文明”的可能。他尝与人说,“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会有高价值的创造”^②。发展科学离不开民主,树人也离不开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般奴才建造起来的”。立国更离不开民主,“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③。胡适一生对民主的信念基本不变,且愈老弥坚。至晚年虽已不合时宜,但诚如他给雷震祝寿时所引用的杨万里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曾为此诗作注“此诗可象征权威与自由的斗争”。这其实是他的自况,他晚年题此诗赠给雷震,与之共勉,也表明了他对民主在中国前途的信心。^④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本来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人文资源。近代以来,伴随国势的衰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她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西方人以一种考古的心态,几视中华文明为一“死文明”。中华民族步入近代以后所作的自我更新和艰难转型,自然带有强烈的民族自强色彩。胡适是较早踏上向西方学习路程的学人,他本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受益者,又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这是他扮演

①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原载《中央日报》1947年9月28日。《胡适文集》第11册,第805、808页。

② 胡适:《谈谈大学》,收入《胡适文集》第12册,第541页。

③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收入《独立时论一集》,北平:独立出版社,1948年8月版。

④ 有关胡适与雷震的关系,参见万丽鹃:《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与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导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1年12月版。